

金陵秋夢

國民黨四十三位首要戰犯歸宿之謎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01/12 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

金 陵 秋 梦 (下)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金 陵 秋 梦(上、下)

作者:何虎生 潘明忠

责任编辑:夏晓远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香河县胶印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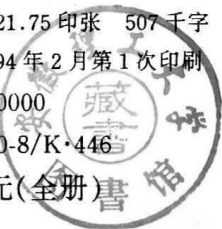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75 印张 507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15-03000-8/K·446

定价:21.80 元(全册)



目 录

把盏北望——“王世杰案”之谜	(352)
无疾而终——顾维钧成为国共两党同时承认为外交 奇才之谜	(367)
长期休养——宋美龄离台赴美之谜	(380)
隔海大骂——“吴国桢案”之谜	(400)
久未归队——刘峙被免职之谜	(417)
坦怀报国——程潜与毛泽东友谊之谜	(431)
被轰下台——薛岳主持国大八次会议之谜	(448)
良好榜样——卫立煌回北京之谜	(463)
种菜赌棋——余汉谋皈依基督之谜	(478)
死非其所——胡宗南几次反攻大陆之谜	(493)
和平将军——傅作义成为第一任水利部长之谜	(509)
离土而死——阎锡山在台湾菁山十年之谜	(523)
忠孝两全——周至柔在台湾仍受重用之谜	(537)
拉毛排周——王叔铭成为空军总司令之谜	(551)
苍海无语——桂永清被免去海军总司令之谜	(554)
立地成佛——杜聿明成为第一个特赦战犯之谜	(571)
病死日本——汤恩伯晚年之谜	(584)
清白难还——“孙立人案”之谜	(602)
撤职查办——马鸿逵晚景凄凉之谜	(618)
撤职议处——马步芳出逃中东之谜	(634)
命运难违——陶希圣晚年生活之谜	(649)
抱憾终生——曾琦反共难成之谜	(662)
学非所用——张君勱误入歧途之谜	(674)

把盏北望——“王世杰案”之谜

1981年4月21日上午，台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王世杰在台北病逝，享年91岁。

1. 从法律专家到政府部长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生，自幼敏而好学，四岁入家塾，12岁到武昌读小学，即1903年入南路高等小学。毕业后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21岁以最优成绩毕业。随即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王世杰拥护革命，辍学南归，返武昌参加革命，投奔起义，任都督府秘书，曾参加守城战斗。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王世杰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支部，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并任留英中国学生会会长。1917年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旅欧中国学生推王世杰为代表，向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力陈拒绝和约签字的主张，随后王世杰任中国留欧同学会代表，先后赴比利时、意大利出席国际联盟同志会。留欧期间，王世杰经常在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英法民主与政治制度，蜚声于时。

1920年冬，王世杰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回国担任

北京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讲授《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深受学生欢迎。还曾一度兼任教务长。1922年，王世杰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民权大同盟，第二年，又与石瑛等人一道发起组织《现代评论》社。《现代评论》社以王世杰为首，以北京大学教授周鲠生、石瑛、王星拱、丁西林、陈源（西滢）、顾颉刚、陶希圣、陈大齐、阳翰笙、张奚若等四十多人为核心，几乎囊括了当代著名学者。《现代评论》第一期上，登有周建人、林语堂、吴稚晖、李石曾、胡适、郁达夫、张资平、沈从文、范寿康、康白情等人的文章，后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曾为该刊撰稿。《现代评论》创刊号刊登启事说：

本刊内容包涵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评。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不认为本刊只是本刊同人的评坛，而认为是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王世杰是国民党员，但《现代评论》基本成员中，国民党员极少。综观连续出版将近五年的《现代评论》，内容服膺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英国的“议会政治”，从未宣传过列入国民党党章的孙中山“五权宪法”。作为：“大学丛书”风靡一时的王世杰著作《比较宪法》中也无此内容。只在他作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部长以后，才不得不以与钱端升合著的增订版形式加上了“五权”一章。他自己没写过公开反共的文章，但在段祺瑞主张以“善后会议”代替孙中山的国民会议时，《现代评论》表示赞同。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该刊只发一短评，对于孙中山的新政纲领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宣言等只字不提。对此，周鲠生曾解释说，当时，在北京出版的《现代评论》对段政权有所顾忌，有些事，不得不采取灰色的态度。这是1926年《现代评

论》迁往上海出版的主要原因。

北伐军到武汉后，王世杰一度出任汉口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受到左派邓演达的牵制，得不到重用，王世杰便转赴南京，自然而然地成为蒋介石的“稷下”问客。

王世杰是南京政府的首任立法委员，同时担任法制局长。其时，李四光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周鲠生在中央大学任教，并在法制局兼职，他们原都是北京大学教授。正谋向南方发展，而且都与蔡元培保持着良好关系。遂由蔡创议筹设武汉大学。在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中山大学）的基础和旧址上，设立了建校委员会，以刘树杞，王星拱，周鲠生等为筹委。与此同时，又聘李四光，王星拱，曾昭安，张难先、石瑛等组成武大新校舍建筑委员会，以李四光为委员长。李四光受任后，以其地质学家跋山涉水实地勘察的精神，踏遍武汉市郊的山山水水，选定了邻近东湖，偏僻荒凉而又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罗家山（后来闻一多先生建议改为今名“珞珈山”）和狮子山一带为武大新校址，随即聘请加拿大开尔斯工程师设计制图。拨建筑费银币150万元，中央地方各认一年。不久，李四光，刘树杞先后去职。1929年2月，王世杰受任为武汉大学校长。他对南京政府教育部宣称“要我当校长，就不是一个维持武大现状的校长。武大不办则已，要办就应该是一个新的、国内一流水准的大学。武汉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于美国，武大应与此重要地位相称。”他制定了创办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十年之后学生万人的宏伟计划。1929年5月，王世杰到职后，首要的一件事，就是抓新校舍的发展建设。

王世杰创建武汉大学，功不可没。武大的校址原在武昌东丁口，是前武昌高等师范的旧址，庭宇陈旧，设备简陋，再加上北伐前学制屡更，校名数易，有声望的教授多不愿久居其位。

王世杰为建新校征地而排除万难，做了很大的努力。当时一股地方封建势力以“占用民地太多”（实际全部是荒山）为理由，掀起迫使武大新校舍停工的邪风。许多捣乱分子接二连三地推起“反对迁坟运动”，公开扬言“不许破坏风水”；“坟不能迁，地不能卖”，邮局寄来匿名信或甚至署名的恐吓信一大批。一批批恶棍甚至进入校长办公室捣乱，威胁说：“如果强迫迁坟，我们就不保证王的人身安全，还要去崇阳挖王的祖坟”。从而又引起了崇阳王氏家族对王世杰的压力。他们甚至搬来中央和省的部分封建官僚出面助威。王世杰据理力争，不稍退让。在武大建校过程中，王世杰只作了一桩妥协，但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学校——旧军阀石星川（湖北阳新人）的一块山地，本已作价卖给学校，但山上原有2千多棵树，他硬说卖山没卖林，声言要砍伐，王世杰要求石星川的一个同乡从中打圆场，结果以每棵二元代价买下，被石星川敲诈了五千元。这个石星川后来抗战时投敌，当了伪汉口市市长。

石瑛先生对武大建校的态度是很支持的。时任南京政府铨叙部长的石瑛先生曾垂询武大建校风波。他说：“我曾多次接到反对迁坟卖地的人的控告信，恭维我‘节用爱民’，希望我在支持他们的歪歪道理。我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驳复了他们。”强调了建武大的重要性。他说“王先生（王世杰）与我见面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一些建校曾遇到某些坏人兴风作浪，语焉不详，”石瑛啧啧称赞王世杰“干得好、有魄力。”

1932年1月，新校舍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原来挤住在旧校舍的全体师生搬进珞珈山，一般教职工，都能分配一套三室带有厨房、卫生间的家属宿舍。至今武大校园、校舍之美，仍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1937年，芦沟桥事变初起，王世杰任教育部长。他认识到

抗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即通知各著名大学（包括武大）作内迁准备。次年日寇进逼武汉，武大西迁四川乐山。南京政府也要从武汉撤退，王世杰曾伫立珞珈山头，俯视这一片他为之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校舍楼馆，山水草木，不禁潸然泪下。

王世杰为了贯彻考试用人的原则，到武汉大学不久，即公开登报招考职员三人。原国民党迪化市市长金绍先以第一名被录取。由石瑛向王世杰校长推荐，特许其半天工作，半天学习，其在武大，从预科到本科，基本上学完了政治、经济、法律各系的必修课程，还选修了历史、中文、哲学课。王世杰选聘教授的唯一标准是学术成就而没有门户之见。教授中，国民党员极少，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却颇多，体现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时“兼容并包”的精神。王世杰先后聘任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范寿康任教授。陶因在武大任教十多年，一贯讲授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在内的经济理论，特别着重介绍剩余价值学说，范寿康原是《现代评论》的核心人物，1933年进入武大，他在《哲学概论》课程里正式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1984年，范寿康曾赞许地谈到当年王世杰在武大“开明办学”，难能可贵。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全国各大学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百般阻挠武汉大学学生请愿团赴南京，甚至不准过江去汉口。双方相持不下，有的学生被扣押。王世杰为此两次过江找何，促使释放了被扣押学生，放行了两三百学生乘轮去南京。当时王世杰对学生提出：“读书不光救国，救国不光读书”的告诫，这原是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时代的用语。王世杰运用自己的影响和组织能力，并通过在南京的罗家伦、陈创修、李铁铮等做工作，武大学生请愿团在去南京的游行和与蒋介石对话时，基本上体现

了“克制精神”，同其他大学代表团比较，颇有“秩序”，也并未去参加焚毁《中央日报》活动，因此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勉励。也可以说这是蒋介石赏识王世杰“办学有方”的开始。这次武大学生代表团团长是王传曾，政治系三年级学生，王世杰的得意门生。陈宽（即陈家康，后来曾任周恩来秘书及驻埃及大使）也参加了请愿团，态度激进，有人传说陈宽是被王世杰开除的，其实是一九三三年，陈宽听说蓝衣社要抓他，便先行逃走参加革命了，并无开除之事。

王世杰聘用的人物现在最有争议的是当时文学院院长陈源（西滢）。此人曾被梁实秋列为“五大散文家”之一，与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并重。大家认为他是《现代评论》文艺方面的主将，他曾维护北平女师大校长杨荫榆长期与鲁迅对立，而鲁迅则认为陈西滢与杨荫榆是同乡，也就在《语丝》上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其实，据陈西滢的夫人说：“陈西滢与章士钊虽都留学英国，但并无其他关系；陈与杨荫榆虽都是无锡人，但从未见过面，只不过女师大风潮时，女生把杨荫榆的铺盖卷扔到大门口，陈西滢认为这太过分了，不应受到鲁迅的支持。”陈西滢明白表示过：“我不能因为我对鲁迅的人格有看法，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不能因为佩服他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陈西滢盛赞阿Q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但认为鲁迅大部份杂感“不值一谈”。二十年代陈西滢与鲁迅之争，其实并不直接涉及政治分歧。陈西滢所攻击的鲁迅的“人格”，主要是鲁迅的泼辣作风不符合他所崇拜的英国“绅士”风度。这也可以说是阶级偏见。

当时武大教授苏雪林，也是《现代评论》的作者，是受到王世杰支持的。她也在讲坛上反对鲁迅，不过写文章公开反对鲁迅是在鲁迅逝世之后，直到现在她在台湾，仍然是反对鲁迅的急先锋。但她当年讲授《中国文学史》仍然把鲁迅的《中国

小说史略》列为重要的辅助教材，学生人手一册。苏雪林跟陈西滢一样，都对鲁迅持“人格与小说区别对待论”。陈西滢其实够不上“五大散文家”之称，但在新中国编写的现代文学史上却很有“名”，那是被鲁迅骂出来的“名”。“现代评论派”也是如此。

1932年3月，任湖北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同时仍任武汉大学校长。1933年4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1934年10月，兼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及主任委员，8月，被国民政府派为海牙公断院公断员。1935年11月任国民党第七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二月，兼任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1938年1月免教育部部长职，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政治部成立后，又兼任指导委员。6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39年11月至1942年1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1年至1943年，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1943年4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9月，当选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同时免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职。1944年11月，再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5年5月任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7月连任第9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同月继宋子文为外交部长。1946年7月，任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1947年4月，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9月出任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首席代表。同年冬，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9月任出席联合国第三次大会首席代表。12月免去行政院政务委员及外交部长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去台湾。1950年3月至1953年11月，任总统府秘书长，1952年11月，任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论委员，1957年10月，连任第八届中央评论委员，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4月，任“中央研究

院”院长。1967年兼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69年4月，连任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1970年4月，辞“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改任总统府资政。1976年11月连任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1981年4月，连任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同年4月21日，病逝于台北。终年91岁。王世杰著有《比较宪法》、《中国奴婢制度》，主编《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等。

1931年、1932年间，蒋介石常由南昌到汉口，每周邀请王世杰讲学半天，从此王世杰深感知遇。于1933年转任教育部部长。继后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中宣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外交部长等职，而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兼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这是一个名小而实大的官，下面只设了六、七个参事和四、五个专员。办公处设在重庆桂花街一个小院里，但它却无事不管。有关国共关系、外交、财经、工业化、战后复员等重大问题，一般都要听取参事室——智囊团的出谋划策，当然不是所有的见解都被采纳，但它对蒋介石的决策确是起重要作用的。举一个例子来说，1944年冬，孔祥熙为了进一步搜刮四川老百姓，竟向蒋介石提出征收人头税的办法来，美其名曰“国民义务劳动税”。蒋介石把这个案子送到参事室审议，引起王世杰的强烈反对，他担心会因此迫使四川老百姓造反。他的“签呈”生了效，这个“国民义务劳动税”专案计划就被打消了。至于他长期代表蒋介石与中共打交道，是人所共知的。王世杰是1945年《双十协定》的签字人之一。王世杰在政治上当然是反共反人民的。但他又是一位醉心政党政治的学术权威。在他发表的文告中，从未使用过“共匪”字样；在私人谈话中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称“先生”。去台湾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改任资政，继续收藏鉴别书画、金石、古

玩，以娱晚年。在九十大寿时，蒋经国曾亲往祝贺。王世杰逝后，遗嘱子女把他的全部收藏捐赠博物馆。还在珞珈山时代，王世杰与陈西滢夫人凌叔华女士都曾以古书画收藏家闻名于时。

王世杰在遗嘱中说，在为他立碑时，只须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由此可见，王世杰对亲手缔造的武汉大学是倾注着无限的深情厚爱的，可谓至死不渝。

“九一·八”事变后，王世杰支持学生运动而又使之“不逾矩”开始受到蒋介石的赏识。王世杰在教育部长任内，曾大力整顿各国退回庚子赔款的组织和使用。他一生中一贯重用留学生。

1938年1月，王世杰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同年6月兼任国民参政会首任秘书长，开始负担起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的联络协调工作。抗战时期他两度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坚决主张联合英美对日抗战到底。同时与苏联密切联系。他还一度兼任中央设计局首任秘书长。这是一个广泛罗致专家、学者的机构，曾提出战时党政军三年建设及西北十年建设计划，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计划等，费了不少心血。抗战时期的外交部长，由宋子文担任，实际上他只忙于对美外交，抗战后期，英属印度、缅甸已变成中国对外的主要道路，王世杰便分担了对英外交的重任。他是中英庚款董事、中英文化协会会长、中国留英学会会长，曾陪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3年他又奉派担任访英团团长，曾向英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及拜访邱吉尔首相。

由于王世杰曾长期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主要任务是与各党派人士接洽，所以他从1941年起，一直与张治中一道负责与中共联系。在他担任访英团长及联合国首席代表时，都曾邀请中共派代表（董必武）参加，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他也是

参加者及“双十协定”签字人之一。1945年5月，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后，王世杰即接任外交部长。他把对美、英、苏的外交摆上了同样重要的位置。

应当指出，王世杰是一位醉心政党政治的学术权威，他不主张消灭“异党”，强调以“选票”而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因此他又鼓吹“军队国家化”、反对中共的“武装割据”。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王世杰请一位参事替他写，那位参事写了洋洋洒洒数千言，结果被王世杰一笔勾掉，自己另写了“君子不念旧恶”六字交卷。他代表蒋介石与中共林伯渠在西安谈判，也正在这一年，因此，这六个字实际上暗示他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未全失书生本色。

2. 抗战胜利后，王世杰接受了一幢洋房和一辆汽车。而其主要功绩，则是签订了两个遭人非议的中美、中苏友好条约。

抗战胜利前夕，王世杰与宋子文赴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1946年又签订“中美通商航海条约”。为这两件事，迟至1948年，国民党立法院仍然一片哗然，不断指责，令王世杰极为狼狽。不得已，王世杰只好宴请倪文亚、邱汉平、张道行、胡秋原等二十多位立法院外交委员，介绍外交工作情况及当时签约背景。后来才知道上述“中苏条约”的内容都是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许诺给苏联的，在美国压力下，蒋介石只好接受，这不是宋子文、王世杰所能决定或更改的。

早在1947年3月，王世杰就曾因《中美商约》大受攻击。王世杰竭力辩解说这个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均等互惠，不但平等，且对我国战后建设有利。这更激起质询者的纷纷指责：中美力量悬殊，中国有何能力在美国开矿、设厂、投

资经营？中国有多少商船可在美国自由航行？有多少产品可向美国出口享受最惠国待遇？这实际上只是中国单方面对美全部开放，美货源源而来，反而扼杀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众口交攻。其中刘健群直奔讲台，指着王世杰的鼻子喝道：“我俩来订个条约好不好？你在我家吃午饭，我在你家吃晚饭，‘平等互惠’；但我刘健群比你块头大，胃口也大，午饭你吃我一碗，晚饭我吃你三碗，每天赚你两碗，这样的平等条约，你敢签订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王世杰在国民党里的艰难处境。他虽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但以学者从政，既受蒋介石的重用，又置身于各派系之外（他否认他是政学系），因此，他虽一再任中宣部长，却不是中央常委。《中美商约》实际是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定案，蒋介石支持的，王世杰也是代人受过。

不过，王世杰当时对《中美商约》的态度，站在国民党亲美派路线的立场，确实认为“对战后建设有利”。他宴请立法院立法委员时，仍然强调“这是一次‘闭关自守’与‘门户开放’的论争”。现在还有人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由摇摇欲坠到经济起飞，在强大程度上都深受《中美商约》之赐。

在国民党要员中，有三个人的脸型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蒋廷黻、吴国桢和王世杰。他们三人全是矮胖的身材，圆圆的面孔，再加上一副眼镜。蒋廷黻喜欢装模作样，整天板着脸，吴国桢却是笑嘻嘻地应付一切事，而且善于言辞。而王世杰原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三十年代曾著有《比较宪法》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经胡适推荐，脱蓝衫换紫袍。王世杰学者气息非常浓厚，做人也非常严肃，他任外交部长时，部里的下属都十分怕他。当你走进外交部大楼各司局办公室，只见鸦雀无声，而每个人都低着头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时候，那就是王

世杰已经到部里办公了，否则，看报纸的、聊天的和吃零食的，都大有人在。有人说，王世杰在国民党大员中，还算是比较清廉的一个。可是在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时，他却让他侄子王德芳当总务处长，在柴米油盐以及平价布配给方面，这位侄少爷却大肆贪污，从中上下其手，而且是他的婶母授意他这样做的。

抗战胜利回到南京，王世杰占了赤壁路一个德国华侨的花园洋房，而且还“接收”了一部华丽的德制轿车。一直到1947年秋，这个德国华侨被释放出来后，这桩“接收”公案，才为南京人所知道。但是下文如何，那就没有人敢说了。王世杰的英语极不流利，可是又非常喜欢说。一到说不出来时，总是把两手交叉起来使劲地转动。记得美国杜鲁门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中美商约》签定时，对手是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在签约前，照例应该有几句寒暄话客气，也不过是“今天天气”之类，可是王世杰就始终说不出来，只见他两手交叉着，象车轮一般地转来转去。在场有一个记者悄悄地说：“王部长原来在练太极拳”，惹得在场观礼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观礼”的有周鲠生、周谦冲等。

王世杰的夫人身材高大，比他高一个头。有一次王世杰访美回来，王的夫人机场接他，飞机降落后，王世杰刚从扶梯走下，离地面还有二级，他的夫人迎上前去，一个中央社记者手持莱卡像机就大喊：“开麦拉”快！不然王部长就太矮了！”结果是一场大笑。可是王世杰表情仍然是很严肃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群体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这一阶层的代表人物大多数是“问政”而不“参政”的学者。他们抗战时期一般充当“忠于政府的反对派”角色。而王世杰是一个例外。他本来就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又曾在政府担任过要职。他居于

当政者之列。

王世杰参政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他对国民参政会有着一定的感情，是因为参政会提供了一个间接的代议制雏形，也为他提供了一块施展夙愿的试验田。他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的性质、人选，到起草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法令，以及扩大参政会职权等种种努力，都浸透了他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自由主义在政治问题上的原则之一，就是主张政党政治。王世杰一直认为中共问题应该政治解决。同时，他还根据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认为不应排斥反对党的存在，这与顽固派有很大不同。1943年10月，蒋介石同意成立宪政实施筹备会时，国民党参政员王普涵坚持一党制不可改变。蒋介石训斥道：“本党以外如无他党存在，久而久之，本党必腐化以至崩溃，其影响将不堪设想。”王世杰听了很有些激动，认为这是蒋自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开幕词以来“对政党问题之第二次重大表示。”显然，蒋介石的此番话有罗斯福献议为背景，但王世杰则尽力从正面理解。

在用人问题上，王世杰也同样表现了与众不同的认识和做法。他曾推荐杨振声、钱端升、周炳林为教育部次长候选人，又延请何浩若接管《中央日报》，对吴之椿、张忠绂等，他亦格外器重。这些人均接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思想上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都是留美学生，而王世杰为留欧出身，在尚存门户之见的时候，王世杰大胆启用新人，以才干为选择标准，这是他的难得之处。另外，王世杰所重用的这些人，比起早期留学生来说思想更为解放，并且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他们在许多方面与王世杰有相通之处，无疑是他推行理想制度的有力助手。王世杰曾主张对政府做一次大调整，说“不能专取材于